

高歌勇进下四川

□ 丁耀华

1949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、华北、中原、华东等各个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,全国人民唱着歌儿表达喜悦心情。

准备南下

我当时在解放军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工作。宣传队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和宣传学习,如练歌、扭秧歌、说快板、拉胡琴等。几位村里的青年,常在家中或家门外自拉自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等歌曲,使得原本宁静的山村热闹欢腾了起来,特别是到了春节期间,部队与地方相互贺年慰问,各单位过年联欢等活动频繁。

部队在年初即有了要进军大西北、大西南的内部消息,并有所准备。过年之后,便陆续有人被调往新区。宣传部的朱丹科长、肖

秦干事和祁云初、李志明最早调到新区组建艺术学校,接着又不断有人被调出支援新区工作。不久,便接到通知,晋绥军区司、政、后机关及所属单位整体南下的通知,部队开始了南下的具体准备工作。

部队在这个山村驻扎有多年,当地群众的支持很大,建立了深厚的友情,在离开之前要将借用群众的住房窑洞打扫干净,桌椅板凳和一切物品原物归还,损坏了的要赔偿,这一切交接办完之后,于4月8日告别了乡亲,整队出发,开始了南下的行程。

挺进晋南

这次南下是从晋西北下到晋南,未走出山西省境,行程有700多里,徒步行走了一周便到达目的地晋南临汾。途经各地,多为老区,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,在部队到达每天的宿营地之前,所需的住房、粮草饮水等都顺利解决。群众的支持使大家深深感受到军民团结的力量,更加自觉严守军纪,严格执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中的各项规定,给群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

到达临汾之后,我们宣传队立即增员扩编,并更名为文工队,由郑英同志担任队长,并新调来几位干部和教员,又开始业务学习和军事训练。根据部队要继续南下和形势发展,领导决定我们宣传队合并到西北艺校,这个学校,是要准备南下的单位。我们整体编入西北艺校为学员队,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之外,主要任务是进行军训,在队长领导下还设有专管军训的军事排,指定我和马士援同志担任排长。经过两个月的军训,队员的军事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,军训结束后还进行了实弹射击和掷手榴弹的演习。

当时我们还有一个任务,迎送攻克太原之后南下参加解放大西北的野战部队,学员队组织了部分同志,每天在南下部队过来之时,在经过的路旁,以呼口

这次南下比上次的南下要艰苦得多。学员队先是徒步行军,行往风陵渡的途中,我们班乘坐了一段路的汽车。这辆车载着后勤供应物资,在满装物品之上可以搭乘几个人。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,不料车一开动,我就感到天旋地转,昏昏呕吐,同班的赵潘龄等同志用被子将我的头蒙住,叫我不睁眼向外看,但仍无好转。到达黄河岸边被扶下车之后,头晕得不能站立,同伴照顾我在黄河岸边就地躺下休息,幸好等渡船的时间较久,在上船渡河前头晕有了缓解,算是过了一关。由于有了晕车的经历,我此后再不敢乘坐汽车。过了黄河后,乘火车往西安前进,我们乘坐的是敞篷车和闷罐车,车上非常寒冷,敞篷车上的同志被冷风吹得发抖。

10月16日到达西安时,我们的队伍穿城而行,走在队前的是身佩短枪的副大队长张达雄同志。队伍

古人说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,果然如此。有的路是盘山绕行,有的路是在山石腰间,人工开凿而就,狭窄低矮,只能鱼贯猫腰弓背而过,稍不留意即有可能坠入汹涌的大河之中。

行军途中,我还经历了一次“历险”。一天,队上派我和炊事员张学文打前站,安排大队伍的宿营和吃饭等事项。临行之时队长嘱咐我们一定要走大路,以防迷路,还要注意防范地雷。但张学文胆大勇敢有余、谨慎小心不足,走出不远他便抄山中小道寻找捷径,我用队长的嘱咐提醒他不能走小道,他不以为然,反说敌人埋地雷是埋在大道上阻挡我军前进,他们埋在荒山小路上干啥,放心走吧。我俩虽然没遇上地雷,但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。直到天黑尚未找到预定宿营的村庄,只能在摸黑中行走。突然发现前面有了亮光,再往前看便看到是个村庄,走到村口便见到寻找我们的同志。他们说我们今天走的有130多里,有几十里是冤枉路,

二次南下

迈着整齐的步伐,高唱大进军的歌曲,引来市民夹道欢迎,掌声、笑声不绝于耳,使我们队伍中的同志都感到自豪。部队开进到西七路一所暂未开学的学校住下,这时大家纷纷说今天感受到人民对我们南下的鼓励。有位老师说今天的场景是西安人民给我们加油,鼓励我们继续前进,我们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,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,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在西安停留期间,我们队加紧休整,在驻地对面的革命公园内加紧排练节目,第二中队将在临汾已排练好的歌剧《血泪仇》在西安公演,在解放不久的西安城引起了轰动。

在西安停留期间,上级决定要西北艺校留部分文艺骨干到西北各

地的文艺单位工作。经组织挑选、个人自愿原则,抽调了部分同志支援西北文艺战线,其余同志经过整顿继续南下向四川进军。

进军四川的行程要爬高山、过峻岭,这些地方尚未解放。野战部队在前面与敌军作战,工作团紧随其后,每解放一个地方,便由工作团派人去建立新政权开展工作。由西安到宝鸡乘坐了一段火车,宝鸡南进便要步行翻越秦岭,敌军在秦岭修筑了工事负隅顽抗,公路及路旁埋了大量的地雷,我军在追击之时来不及挖取地雷,工兵部队在探出可能有地雷的地方用石灰画了圆圈,让后续部队注意安全,不要踩到地雷,所以在行进中必须低头看路,绕过白圈,一路上真是险象环生。

南下四川

所以打前站变成后尾了。我暗中庆幸还算好,找到了部队,不然可就危险了。

部队进入四川,自然环境与山西、陕西有了明显的不同,放眼可见青山绿水、肥沃土地,但高山峻岭仍随处可见,每天行军还是爬上爬下,蜀道依然难行。

在川北沿途还常见到有的人脖子很粗,甚至还有的人颈项上长有大肿瘤,据说是当地水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而造成的。闻听此言,许多同志喝水时有点害怕,特别是年轻爱美的女同志,不时摸摸脖子担心长粗。在广元住下时见到驻地的老乡许多都有此病。我们队长是个见多识广的人,他对老乡说大脖子病是饮水中缺碘,多吃些海带便可以防治,老乡哈哈一笑说,我们包谷(玉米)都吃不起,还吃海带哩。可

见当时川北农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得很,正如我们在挺进歌中所唱:“那里的穷苦老百姓,多年来受着灾难与苦痛,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去解救他们。”我们看到了歌词反映的真实场景。

由广元再向前便进入四川腹地。沿途环境优美,气候温和,土地肥沃,沿途还可见到许多名胜古迹等诱人景观,大家在行军中感到轻松多了。这时在队伍行列里又发出了歌声、笑声和“同志们加油走,绵阳成都在前头”、“同志们加油干,去到成都过大年”等喊声。到了临近成都的弥牟镇时,成都已经宣布解放,奉命休息了两天,整顿军容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进入了新生的成都。

在这两次历经40多天跨越晋、陕、川三省,行程4000多里的南下四川中,我个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、传统教育和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,同时受到艰苦奋斗、克服困难的锻炼,为永远跟着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贡献打下了基础,因此1949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一年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仍然时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。

